



不久前,受北京卫视《最美中轴线》栏目邀请,我与国内歌手龚琳娜、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同访地坛,向他们介绍地坛,也介绍史铁生,并且分享我的故事。

地坛,是北京中轴线上一处地标性建筑。上世纪90年代,史铁生的散文《我与地坛》发表。在文章中,史铁生叩问灵魂、追忆母亲、观照百态,文字生动而深刻,其“向死而生”的人生态度,感动众多读者。地坛也因此被更多人知晓,并多了一分文学的记忆。

这次拍摄为什么会邀请我?想必,与我的经历有关。乍看上去,我与史铁生有不少相似之处。比如,我们都是北京人,都是因为疾病从健全人变为坐轮椅的人,都经历过人生“至暗时刻”,都是靠文字表达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位置……这么看来,由我分享与地坛相关的人与事不显突兀。

我是80后,史铁生所处的时代,我没有经历过。真正相通且能引发共鸣的,是人性深处对美好的渴望、对浴火新生的崇敬。

## 在海岛教孩子写诗

周其星

当我支教结束,从南澳岛回到深圳,我在海岛的学生,依然在坚持写诗:浩菲写了几十首,用完了几个本子;章艺说要成立“11星诗社”,“11”是11班的意思,“星”来自我的名字。而在这年暑假,她投稿给国际儿童诗歌海滩计划的诗作《雾》,获得了优秀奖。

这段不足一年的支教经历,如今回想起来,已成毕生难忘的记忆。

我的诗歌实践首先是在城市里推行的,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我在学校成立星星童诗社,每周一次组织诗歌读写创活动。无论是走出教室去看天上的云彩,还是观察校园里盛开的炮仗花;无论是蒙上眼睛探索学校,还是举办光脚丫草地诗会,都能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。然而,现代诗歌教学并未在更大范围普及。

我在海岛的实践,让我深切感受到,现代诗歌教学完全可以大范围普及,吹着海风听着海浪长大的孩子,同样能够写出透明清澈充满想象力的诗句,并不逊色于城市里的孩童。

还记得登岛之初,班上的学生只会指着书上的字句拖腔拉调地读课文,家里、教室里可读的书挑不出几本,就连学校门口的博物馆、图书馆也从未踏足,更别说岛外的世界。他们对海岛的历史、文化、民俗以及地形、地貌像我这个外来者一样陌生,连岛上有哪几座灯塔都不知道,更别提什么现代诗了。

那就从最基础的做起——读诗和抄诗。

我每天从“星星新诗社”公众号里挑选适合他们阅读的现代诗,要求朗读并抄写在我送给他们的诗歌本上,每天一首,从不间断。

同学们第一次尝试写诗是从谢尔·希尔弗斯坦的《如果之歌》开始的。

当同学们抄完这首诗后,猛然发觉:原来写诗这么简单!只要将自己的担心和假设一句句写下来,分行排列好,就是一首诗!

于是,大家不再满足于抄诗,更希望自己能写诗。我顺势答应,诗歌的种子已然萌芽。自此以后,我们每周都会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诗歌指导,这些抄诗的孩子开始笨拙地写起诗来。他们写南澳岛上的壮丽日落,写切分海浪和风的礁石,写把歌声染白的雾,写吹得人寸步难行的风……当同学们把身边的事物写进诗里,他们就开启了诗人之眼,并以此去注视生活,去审视人生,去打量这座并未好好阅读过的海岛。

在看过短视频“快手上有超过60万人在写诗”以后,同学们发现,很多人虽然身在基层却仍在坚持写诗,诗歌不是语言的游戏,更不是无病呻吟,它自有神奇的伟力,不仅可以记录生活,更能与自我对话。于是,成绩不佳但天天拿着诗歌本的小树同学写道:“我开心的时候写诗/我不开心的时候也写诗/我用诗来记录/也用诗来抵抗”。丽玥的《弟弟》更是直击人心:“两年前/我十岁/弟第八岁/两年后/我十二岁/弟弟还是八岁”,平白如话的语言不需修饰,情感自然喷涌,痛彻人心。

岛上的孩子,经由诗歌,破解了语言的密码,也找到了打开自己的钥匙。从长短短短的诗行里,我们可以洞察童年的秘密,也能知晓儿童的生活。教师和孩子家长,可以借此走进儿童的世界,因势利导,教育启发。

不到一年的时间,岛上的孩子就掌握了写诗的基本技法,他们知道《如果你要写春天,就不能只写春天》,他们学会了《赞美一棵春天的树》,他们品尝了《夏天的味道》……他们给自己取笔名,他们写好一首诗就迫不及待发给我,跟我讨论如何修改……诗歌已然成为他们最为关注的事物,也是他们闪闪发光的生活。

离开海岛两年以后,我带着深圳的学生重回南澳岛,跟以前的班级学生手拉手结对,我们在海边读诗写诗,现场创作的诗歌,我一一收集起来。海岛上的孩子,不再是沉默的礁石,而是语言的舞者。

清晨的云朵还停栖在半山腰,石灰窑前已是人头攒动。伴随袅袅青烟飘荡出阵阵麦香,面包窑第一炉金黄喷香的面包出炉了。村支书刘志亮抱了一捧柴火走到窑炉前,往炉中添了一把火。这里有两座高达几十米的窑炉,一座是面包窑,一座是“窑书房”。一眼看上去,实在有些梦幻色彩。要知道,这两座窑20年前烧制的是石灰。

上世纪90年代,浙江省常山县路里坑村是远近闻名的“石灰村”。三衢山脚下,100余座石灰窑昼夜不息,满山石头在烈灼中化作生财的石灰。

“村民的口袋鼓了,青山却蒙了尘。”村支书给我递来一个面包,向我讲起村庄的故事。到了本世纪初,石灰窑陆续关停,轰鸣声戛然而止。没了窑火,村子就像被抽走了魂。年轻人外出谋生,留守的老人守着矿坑,刘志亮也进城做起了生意。

后来,三衢山被开发成石林景区。许多游客到村里来玩,村民顺势开起了“农家乐”,还把村里的农特产品拿出来

## 我们与地坛

蒋 萌

史铁生将地坛看作“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”。“祭坛石门中的落日,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,地上的每一个坎坎都被映照得灿烂”“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,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,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”……透过这些文字,能看到他内心的孤寂与落寞。同时,他洞察到落日光辉的灿烂,捕捉雨燕高歌的灵动,这又何尝不是他心中悸动与热望的映射?

最初阅读《我与地坛》,是在我患上罕见脊髓病变、经三次大手术、虽死里逃生却落下下肢瘫痪的严重后遗症之后。《我与地坛》中流淌出的点点滴滴,特别符合我当时的心境。那时14岁的我,行动不便又羞于出门,万念俱灰又青春萌动,无法重返校园又忍不住开始自学。在复杂的心态挣扎中,我似乎在这《我与地坛》里看到一个“同路人”、一位把我的感受以另一种切身记述表达出来的“前辈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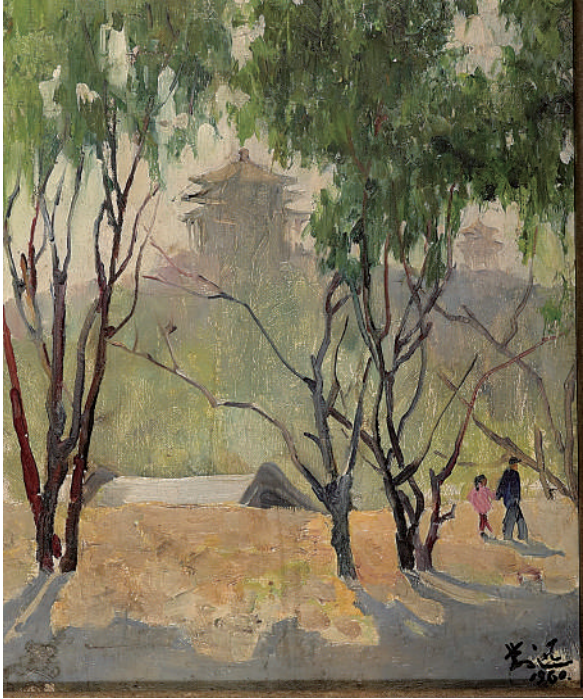
史铁生和我又都是幸运的。经过时间的沉淀与感知的积累,我们在不同的时空开启各自的写作之路。我偶然接触到写作,第一次投稿竟获得发表,这真令我兴奋。写作好似“救命稻草”出现在我

的生活中,我隐约感觉到它是个“突破口”,必须牢牢抓住它。

当然,真实的写作远比理想的放飞难得多。“你担心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文思枯竭,那样你就又完了。”“凭什么那些适合做小说的生活素材就总能送到一个截瘫者跟前来呢?”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写下的这些文字,不就是在叙述当时的我吗?同样的“枯竭恐慌”包围着我。

《我与地坛》没有给予所有答案,但它给予了“史铁生能行,我是不是也能行”的激励。回过头看,随着自己在写作中学习,在学习当中写作,在一步一个脚印中探索,在一篇又一篇文章中积累,我的恐慌和忐忑渐渐消散。在跌跌撞撞的蹒跚行进中,前路慢慢显露出它的包容与可能。我的文章陆续登上曾经感觉遥不可及的报刊或网络媒体,慢慢将自己的创作结集成书,出版四部著作,自传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名单……一路走来,我才更理解“它们无法变成语言,有些事只适合收藏”的意味。

除了《我与地坛》,史铁生的《病隙碎笔》《命若琴弦》《务虚笔记》等作品,我也



▲油画《角楼》,作者刘迅,中国美术馆藏。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  
本版责编:张珊珊

我一直在等——等峡峪河蜡梅开花的日子。峡峪河的蜡梅只开白花,花开时,漫山遍野竞相绽放,如皑皑白雪般纯净,香了一条河,白了两岸山。

这天,天气陡然晴好。盛支书说,上山来吧。

小车一路拐,一路绕。盛支书早早站在屋门口迎接我们,公路边的三间小平房是他的家。放眼四望,村子里的民居都修成了小洋楼,唯独盛支书的房子朴实无华,看上去不大协调。小平房旁边是盛支书精心培植的梅园,花儿正开得奔放。有调皮的梅枝从砖墙缝隙里钻出来,举一把白花风中乱颤,招惹着前来赏花的我们。

盛支书站在园子里,随手攀过一根梅枝,给我们介绍梅花。峡峪河的白梅花期长,可开到120多天。你瞧,梅枝上一层花正开得灼灼,另一层花蕾早已悄悄爬满枝头,只待先前的花朵凋零,它们就相继盛开。从冬到春,峡峪河的梅花就这样一轮撵着一轮常开不败。满是白花的枝条上不见一片绿叶,这里的白梅是花开不见叶、散叶不开花。而且,所有的花朵都面朝下开。我捧起梅花细细观赏,急于找到其中奥秘。喇叭形的花朵全是倒挂金

盏。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都是写实性写作,都源自史铁生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。史铁生从不掩饰消极情绪和对生死命运的思考,但这并非全部。静心品读其文字,会发现他渴望并努力走出沮丧,让阳光照进并驱散黑暗,他在文字中获得在世间驰骋的可能,用思想与更多人交流。我也希望自己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。

好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。《我与地坛》经常出现在各类图书榜单中,史铁生也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,00后最爱看相关内容。Z世代的00后与生于1951年的史铁生产生“精神共振”,是“代沟”无法解释的。在00后眼中,史铁生拥有“人间清醒”“直击灵魂”“治愈内耗”等诸多头衔。当下的一些年轻人试图从史铁生的作品和经历中获得某种能量。

我时常去地坛,走一走史铁生走过的角落,放空自己,寻找灵感。地坛,也是能勾起我思绪的地方。

今天的地坛,与史铁生笔下“荒芜但并不衰败”的园子已大不一样。建筑得以修缮恢复,地坛成了更多人的休憩游玩之所。老年人在这里健身下棋,小朋友在这里玩耍嬉戏,笔墨飘香的书市、金秋的银杏叶、新春的庙会更是吸引了大批读者和游客。

那些苍黑的古柏,曾经默默地看着史铁生在园中寂想,今天依然静静地见证着人、景、物的变迁。在古柏下,恍然间或许会有一个摇着轮椅的身影。是他吗?

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  
本版责编:张珊珊

钟,它分内外三层,外层是白色的花瓣,状如狗牙,洁白如玉,当地人干脆称它“狗牙梅”,中间是一层嫩红的蕊萼,花的中心则是柱状的雌蕊。雌雄同体的白梅喜寒,只在极冷天气里才喷出足够的馨香,供人品赏。

从沉醉里抬起头,园子里那棵开着黄、白两色花朵的梅树牵绊住我的目光。

峡峪河不都是白梅吗?盛支书告诉我,黄梅是他前年从浙江引进的,嫁接于本地蜡梅树上,便有了这一树两花的奇观。看惯了白梅的村民争相把盛支书请来,让他帮忙嫁接黄梅。

盛支书参过军,退伍回乡后先干了8年民办教师,后担任村支书。站在梅树间的盛支书给我们讲述着村里的故事。他兴致勃勃,脸上盈盈地微笑,这时,一阵风吹过,洁白的花瓣落了满身。

在村子里随便走,暖融融的,到处都能看到屋门口的水泥地坪上围坐着三三两两的村民。听说我们专门上山赏梅,人们热情指路,有人干脆主动带路,领着我们参观他家的梅园。

在一片不大的梅园里,我看到3名学生坐在地上下写画画。他们神情专注,我不忍打扰。偷瞄一眼,只见一棵棵梅树、一朵朵梅花被他们搬到画板上,栩栩如生。

烤箱,用来烤面包刚刚好;另一座把顶部空间改造成地质科普空间,以及一座尖顶书房,简直太美了。这座窑书房,面积虽不大,视野极佳,山中四时,晨昏晴雨,时时都有不同的美景。

大年初二上午,村民们在面包窑前舞龙庆祝,面包窑书房算是正式开业了。客人点一杯咖啡,左手面包,右手书本,坐在窑书房的窗前,静享乡村半日的静美时光。窑还是那两座窑,窑内的风景却已不同。两座窑不再空洞残破,而像是艺术杰作矗立在天地之间。窑火似乎也从未熄灭,只是换了燃烧的方式,从前烧石炭谋生,如今为乡村筑梦。

喝完咖啡,我去村里走一走。废弃的猪栏,已变身“三衢艺术馆”,斑驳土墙上挂着乡土摄影作品;矿坑里铺上木板道,帐篷与泳池成了星下的桃花源;村里的妇女学会了磨咖啡和拉花,大叔转身成为面包师,许多小青年从城里赶来,在半山腰的书房喝起了咖啡。你看,窑书房的窗前,扎着羊角辫的女孩坐在晨光里读书,仿佛山间绽放的花朵,已将春天照亮。

23岁那年,我离开潮州外出谋生。其后10多年时间里,我的家人也陆续离开潮州,只在过年的时候才回家住上几天。归家却似度假,拉杆箱进家门,拉杆箱又出家门,便是匆匆一年。只有在老家,离别变得如此具体,不是隔空无声的挥手,而是拉杆箱轮子碾地而过的声音。

父母在慢慢变老,他们当然热爱家乡,却被动跟随我们兄弟姐妹迁徙,帮我们照看孩子。春节假期结束,他们会以元宵祭祖的理由,多停留一个星期。这时他们无比珍惜与这片土地相处的时间,然后在离开之前,浇花打扫,把房子里的一切还原。

我们明白迁徙的代价,很多东西就如同断线的风筝再也回不来了。直到某个早晨,我在广州的高楼上醒来,窗外暖阳初升,我坐在沙发上开始烧水泡茶,一个人慢慢悠悠了起来。三杯过后,精神大好。放下茶杯的刹那,我心中大惊,一个熟悉的身影浮现在脑海——晨起早餐之前,喝一杯工夫茶,这个习惯理当是白毛公的,何时悄然转移到我身上来的?

白毛公是我外公。满头白发是他的独特标识,于是被我们喊作白毛公。12岁之前,我跟着这个古板的老人生活,他给我取名,对我严格管教。他写字板板正正,衣柜里有同样板板正正的衣服。衣柜旁边是他最喜爱的手杖,手杖把手上刻有一只猫头鹰。他喜欢一手摸着猫头鹰,一手给他的四盆玫瑰花浇水。不过浇花之前,他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摆弄工夫茶具,慢慢悠悠冲茶。茶盘很小,茶杯也不大,每杯一口刚刚好。他端起茶杯,放在鼻子下面,停住闻一闻香气,然后才开始喝茶。

人到中年,属于我的潮汕基因才重新觉醒,我开始在清晨冲茶。在潮汕方言里,喝茶要说食茶,茶叶被称作茶米。在这里,茶不是饮料,而是一种食物,是生活的必需品。而且必须是工夫茶。若用大茶杯,直接开水泡茶叶,是会被大家看不起的。在潮汕地区,家家户户都备有工夫茶具。就连建房装修之类乱糟糟的工地,只要是潮汕的工人,他们必定会在忙里偷闲时,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一套工夫茶具,三五人围坐在一起开始冲茶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就连乞丐也有工夫茶具。小时候官塘镇最大的集市叫后亭,就在小镇地势最高的地方。每次跟着白毛公去买菜,要穿过七弯八拐的小巷子,经过一段比较平缓的台阶。在台阶拐角处,有一个乞丐不分寒暑窝在那里。白毛公路过时,有时会给他一点零钱,有时会给一点食物。于是乞丐远远见到白毛公,便热情打招呼。乞丐有一套工夫茶具,我见过,缺角破损也就要了,关键也是不干净,全是茶垢。他还有一只炭炉,水烧开后溅落在炉子上,滋滋作响。乞丐用他被寒风冻裂的手开始泡茶,

## 簪花人

华明明

来到福建泉州,当地朋友一定要带我们去蟳埔村体验簪花。“鬓毛不属秋风管,更拣繁枝插帽檐。”杂与簪簪花,偶遇鬓钗斜。”从古人的诗中可知,彼时簪花的手法,或是在帽上簪花,或是将鲜花与金钗玉簪组合成烂漫头饰,女人簪花,男人也簪花。难道蟳埔的簪花,也是这样?朋友笑答,到了蟳埔,你自然会明白。

蟳埔是个渔村,去往蟳埔的路上,早春的咸鲜海风扑面而来。一走进蟳埔的街巷,就遇见不少头戴簪花、身穿各色汉服的游客。簪上花,游客们不自觉也昂首挺胸、步履款摆起来,眉目含笑,摇曳着头上的旖旎风景。在此地,一年四季有不同的簪花习俗,春天繁花盛开,是簪花打扮的旺季。

正好,我家外甥女留着及肩长发,我们便公推她去体验一下这“钗边烂熳插,无处不相宜”的乐趣。

我们选了一间婆婆主理的簪花店。婆婆虽然年事已高,白发稀疏,却依旧头戴“簪花围”。她精神抖擞,见人带笑。她一面招呼女孩坐下,一面动作利索地将她的长发扎成高马尾,再将马尾拧成螺旋形,一圈圈地盘绕在后脑勺上。当这扁平圆簪盘好后,婆婆在发髻的中心插入一根鱼骨钗来固定头发,紧接着,她小心翼翼地绕着发髻的外围,为女孩戴上两层时令鲜花缀成的花串。婆婆早就用细细的铝丝穿好这些花串,

招呼白毛公喝茶。我拽了几次白毛公的手,暗示他别喝。但白毛公还是伸手去端起茶杯,喝完再小心放回去。乞丐十分感激,弯腰还礼。回家的路上我抱怨白毛公不注意卫生,喝了那杯茶会拉肚子。白毛公却笑着说:“人家相敬,拉肚子也得喝,不过确实无茶味。”第二天他给乞丐带去了半包茶米。乞丐见到茶叶如获至宝,却没有弯腰行礼。多年之后,我回忆这个情景,才懂得白毛公去喝那杯茶,是比送一包茶叶更大的尊重。

这些年,很多人通过视频里的英歌舞和营老爷知道潮汕,然后来到潮州古城旅游。逢年过节,潮州古城人山人海。游客吃着潮州的特色美食:鼠曲粿、红桃粿、官塘牛肉火锅、粿条卷、蚝仔烙、腐乳饼……除了美食还有美景,韩江上有湘子桥,古城里有牌坊街,还有精致的潮绣、木雕和民居。许多人对潮州的印象是热热闹闹,活力无限。但其实,潮文化有动的一面,更

有静的一面。我倒是觉得,热闹是潮州的表象,真正的潮州其实非常安静,这里的时间千百年凝固不动,就如茶炉水沸,看起来烟雾缭绕,待到茶在杯中,一切又澄澈如镜。

懂得工夫茶,才懂得潮州人的灵魂。我父亲是个农民,不识字,他的农民朋友也会到家里来。两个人静静在沙发上对坐,抽烟喝茶,半晌才喊了一声:“食。”弟弟总结过,他们整个下午唯一有效的信息交流是豆角一斤比昨天涨了两毛钱。更神奇的是,这样的情景在几天后还会重新出现,区别仅是窗外的四时变化,是蛙声一片,还是雨打芭蕉。“有闲来食茶”在这里不是一句套话,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以前我和弟弟会将父亲喝茶的情景当作笑话。弟弟说在深圳时间是按15分钟为单位划分板块的,时间就是金钱。而今弟弟已过而立之年,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:“其实老爸这样喝茶也挺好的。”我明白他的意思。当在办公室的格子间忙起来常常忘记喝水时,一个人总会怀疑幸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。

在我的小说里,潮州曾被虚构成一座叫“退城”的城市。之所以叫“退城”,是因为它在时代滚滚浪潮之中坚守传统,留出余地,留出空白。潮州为什么会成为重要的文化标本,也正是因为某个后仰的姿态让人感觉到很酷很潮,是后撤的坚持让这里依然保持天人沟通的自然形态。有一次老家的朋友送我一只雅致的盖碗,我用不顺手,总觉得还是手拉壶更适合我。直到她看见我笨拙的冲茶技术以后,才对我说:“盖碗没问题,是你这个假潮州人太急了,开水不该冲满,只倒八分,出水要慢,控制速度,不然必会烫到手。”我闻言恍然大悟,果真如此。世界教会我做事,但老家潮州一直在教会我生活。

用湿润的白纱布盖着,客人来了可自行挑选。早春の時令鲜花有茶花、长寿花、小苍兰、水仙花、大花蕙兰,还有各种颜色的仙客来。外甥女挑选了小苍兰花串和大花蕙兰花串,婆婆帮她戴好后,又在鲜花串的背后对称地插上十几枝艳丽的仿生花,再以发箍固定。

外甥女看着镜中,对自己的造型相当满意。婆婆却要我们等一等,自己爬梯子,手持大剪刀,到屋檐上剪下一些三角梅的花枝。我们抬头看,才发现二楼的露台上,有一棵三角梅,看样子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树龄。此时,粉白粉红的花朵在阳光下披垂,花的瀑布一直垂到一楼的屋檐上。

婆婆把新鲜的三角梅插入仿生花的间隙,她解释说,蟳埔的“簪花围”不能用单一的花,一定得是生花(鲜花)和熟花(仿生花)的组合,也需要鲜艳夺目、香气扑鼻的规整花串与比较长的独枝花搭配使用。这样,花才是“活”的,戴起来又像才子佳人戏中的角色,又像你自己。

我们都夸婆婆“审美在线”。婆婆笑答:“什么在线不在线的,我只知道,自从开了簪花店,往来都是爱美的年轻人,她们赞我的手艺,把我也夸得年轻了。你们猜猜看,我今年多少岁?”

见我在她的白发与簪花、皱纹与红润面颊上不断探索,不敢下结论,婆婆微笑着说:“我今年85岁啦,学簪花的时候,我师傅25岁,我78岁,我是她奶奶辈的徒弟。如今,我出师6年多了,手艺可还行?等你们再来,夏天有茉莉花,秋天有桂花和千日菊,冬天有蜡梅,婆婆再帮你们打扮!”

